

一月光明书榜

读书者说

汉字出国后的故事

□ 刘晓峰

从远古到今天,从甲骨文到电子阅读,汉字作为系统文字,是我们习惯使用的表意工具。我们从小学习汉字,我们使用汉字书写,利用汉字阅读,我们生活在汉字的国度里,汉字就是我们环境的一部分。可是很少有人想过,如果汉字出国了,它会遇到什么?如果汉字在国外生活了1700多年,汉字会变成什么模样?

世界上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,叫笹原宏之。笹原宏之几十年来以汉字为研究的主业。在日本,他被戏称为“汉字博士”。在他那里,汉字是“超级有趣”的世界。他以汉字为话题四处演讲、座谈,以汉字研究活跃于媒体,写了《汉字的现在》《汉字中的“日本心”》《日本人与汉字》《汉字与社会》等多部著作。新星出版社刚刚出版的《日本的汉字》,是笹原宏之的代表作,被收入了日本著名的岩波新书中。



相扑中的“千種乐” 资料图片

汉字书写方法。在他们笔下,汉字时而是因为祈愿演出观众上座儿,笔锋右侧上挺,时而用粗线模仿力士巨型的身躯,时而极尽圆润预示万事圆满。江户日本人的造字技术也突飞猛进。日本人继承了中国人对于奇数七、五、三的喜好,演出歌舞伎的剧目文字要求是单数,但偶尔会出现偶数,比如“花舟登淀川活”这出戏题目是六个字,灵机一动他们会把其中两个字写在一起当成一个字,如将“舟登”连起来写,题目就变成了五个字。“艘”这个字用的次数多了,就有了自己的读音叫“IKADA”。不管那些有学问的学者们如何反对,几百个我们不认识的汉字就这么产生并被使用。借借旧宣传画上留下的吉光片羽,看到那么多我们已经不认识的汉字,想一下这些陌生汉字每一个都曾使用过,都曾经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,我们就不得不重新想象,想象汉字曾拥有怎样一个巨大的世界。

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,江户日本人深得此中三昧。日本的大相扑,最后一场称为“千秋乐”。但在

日本电视屏幕上我们看到的通常写作“千種乐”,这也是江户时代留下的传统。江户人放着一个简单的“秋”不用,反而找到一个难写的异体字“種”,道理之一是“種”中有“龟”,有“龟”吉利。而且过去江户城到处是木板房,最怕着火,而大相扑聚来看演出的人很多,容易失火。写为“種”则避去了“南方丙丁火”,加上了“北方玄武水”,正有驱灾避疫从吉顺祥之意。并且“種”古色古香,看着很帅。

日本人有时按照道理来造字,比方上了年纪的女人称“姥”(BA-BA),那么上了年纪的男人就该称“姥”(JJI),你看了觉得对就是对,就是有点怪。有时就是很方便很随意,但深得造字神韵。到过日本神社的人,大都看过在树或木桩间横拉的绳子,这在日本叫住连绳。神道中住连绳标志着界限,表明过去就是神界。于是我们看到一个“亻”和“神”组合成的新字“避”。这个字早在15世纪后期就被造出来,表达的就是神境之意。我推想,这字缘起于象形造字的思维,“亻”大概一开始就是围着“神”划了那么一笔。今天这个字写的时候也经常从左上角一笔兜下来直到右上边,够神的。

出国1700多年中,汉字也出现了回头反哺故国的现象。最经典的例子,是“腺”。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,使用“腺”的词汇大都和医学相关。就是唾液腺、汗腺、胰腺、甲状腺、肾上腺等词汇中出现的“腺”字。“腺”是日本人造的字中,最被我们熟悉并经常使用的汉字。这个字从发音来看,很像是诞生于中国的汉字,但事实上,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造的字。18世纪后期,日本人通过荷兰人接触到了西洋知识,当时称作“兰学”。“兰学”中数1774年杉田玄白所著解剖学著作《解体新书》影响最大。这部书使用《万叶集》中用汉字标注的旧本,最初将“klier”翻译成“肌里爾”。但这种译法很不方便,比如扁桃腺被翻译成“巴旦核肌里爾”,长长的,看着就不舒服,后来把“肌里爾”改译成“吉難盧”,可一旦与“肺”“肠”“骨”组合时免不得让人看着觉得头重脚轻,读着也不合辙。后来干脆放弃发音用单纯的汉字来表意,尝试着使用了“濾

日本汉字是汉字吗?

《日本的汉字》内容丰富。它从日本人如何接受汉字,汉字如何在日本发生变化写起,一路讨论日本的常用汉字,汉字与日本社会、汉字与地名,日本人怎样造字。从写在木简上到输入计算机的汉字,从“群体”“地域”“个人”的角度层层解析,徐徐道出一部汉字在日本与时代共同演变的历史。笹原宏之强调要从正面看汉字的演变。他在《前言》中指出:“日本的汉字当中,有些字被以汉籍为典据的汉和辞典称为‘俗字’,不予收录。殊不知,这些俗字中恰恰蕴含着日本先人的许多努力。他们为了将汉字改造为日本人的文字,继而改造为能更有效表达日语的文字,曾对它进行过无数转用、改造和创造,付出了许多努力。我们固然要从字源、熟语和故事成语中学习古代中国,但绝不应当受其束缚,被其捆绑。既然我们一直致力于将日本的汉字改造为日本人使用的文字,一直在摸索日本汉字最为贴切的表达方式,就应该正视它,满怀自信地使用它。”

“我们固然要从字源、熟语和故事成语中学习古代中国,但绝不应当受其束缚,被其捆绑”,这是非常发人深省的话。从4世纪汉字传入日本到今天,汉字在日本列岛使用了1700多年,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值得骄傲的事。但我们需要认识

的另一面是,存在于日本1700多年的汉字,发生了许多变化,生长出许多新的内容,它已经是日本人自己文化传统的一部分。实际上不仅是日本汉字,整个传入中国的中国古代文化都是如此。

我们需要思考的是,作为汉字与文化母国的中国,该如何认识和接受这些变化?

这是我们在生活中早就遇到的实际问题。日本天皇即将退位,今年是日本最后使用平成年号的一年。当初宣布使用“平成”年号的是已故的小渊惠三,后来当过日本首相。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,他的真名叫“小渊惠三”。在日本人看来,我们一直在写错别字。而我们似乎也忘记了,《康熙字典》中就有这么一个汉字沉睡在那里。

信息化时代的今天,汉字正走在一个变化的路上。“五四”时代,因惧怕汉字笔画太多影响社会发展,简化汉字盛行。今天很多人借电子信息处理能力的飞跃提出复古思路,喊出回归繁体字的口号。在汉字国际化方面,中日韩三国之间一直有一批知识分子在推动三国通用汉字。《日本的汉字》这本书则在提醒我们,汉字出国后,已经养出许许多多日本“俗字”。它们也是汉字大家族中的一员。我们是否应当思考一下该不该打开国门,让这些汉字归来故国?在未来的汉字数据库中,是否需要扩大范围加入日本“汉字”,给他们确定在中国准确的字母和字意?时代在追问,汉字的字母是否有能容下日本汉字的胸怀。

(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)

《长安与河北之间: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》
仇鹿鸣 著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《忍辱负重的使命:美国外交官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与劫后的社会状况》
[美]陆东屏 编著/翻译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《应物兄》
李洱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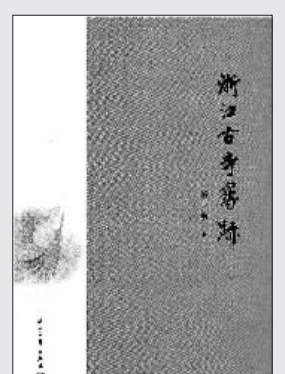
《老舍评传》(增补本)
关纪新 著
北京出版社



《日本的汉字》
[日]笹原宏之 著,丁曼 译
新星出版社



《浙江古寺寻迹》
郭学焕 著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《丝路文明十五讲》
张信刚 著
北京大学出版社



《消失的古城: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》
王笛 著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

《燕国八百年》
彭华 著
中华书局



《人类帝国的覆灭:一个机器人的回忆录》
[法]常博逸、[法]弗朗索瓦·罗什 著,蔡榛颖 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从另一种视角阅读浙江——读《浙江古寺寻迹》

□ 严红枫

代嫡系长孙、最后一任孔氏南宗奉祀官的孔祥楷回到故乡管理家庙事务。这背后重要的推手,就是当年主政衢州的郭学焕。自此,衢州既有孔氏家庙,又有孔氏宗子传人。

20年后,他离开讲坛,潜心追访历史,撰写了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一书,向世人揭示了衢州为什么会有孔氏家庙,孔子嫡系长孙怎么会出现在衢州的谜底。

“郭书记,继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,这次,您怎么又想到写这么一本冷门书的?”(因为衢州是我的老家,我一直这么称呼他)面对我的提问,郭学焕反问我:“‘古寺’这两个字,会让你想到什么?”

“是‘竹径通幽处,禅房花木深’的诗画意象吧?”郭学焕说:“其实,‘古寺’,不仅特指佛教历史意义上的‘古老寺院’,同时也是一种深植于历史长河中的‘文化意象’,并在广大民众中具有普遍影响的‘历史记忆’与独特的‘文化符号’‘文化景观’。因此,‘古寺’也是一种具有中国元素的‘文化现象’。”

郭先生虽没有正面回答我的提问,但是我已经找到答案:这源自他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。他想通过“让文物说话,让历史说话,让文化说话”,向我们展开一幅浙江寺院文化的画卷。

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,便与华夏文化相交融。佛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而佛教寺院文化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。隋唐以后,佛教寺院创建越来越普遍。佛教寺院中的殿堂、佛塔等建筑,铭刻、雕塑、绘画、书法、楹联、诗词等艺术作品,皆反映了佛教和社会发展的历史。在浙江佛教的沿革过程中,古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。

“中国佛教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浙江佛教的沿革过程中,古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,值得记录。”郭学焕说:“同时,记录浙江佛教古寺也是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也能为建设文化浙江、促进浙江旅游事业和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。”

2013年,在完成了《孔子后裔在浙江》的撰写后,郭学焕便开始着手撰写《浙江古寺寻迹》,介绍浙江佛教文化。

浙江古寺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,撰写时,郭学焕要求自己,一是要尊重史实,如实记录。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件事,他会查找几处史料,以互相印证。遇到个别史料有不同记述,无法确认时,他便把不同之处一并罗列,让读者和历史再作验证。二是一定要实地寻迹、考察,走访当地、当事人,听取他们

的介绍,从中了解情况,寻找史料,现场体悟。

浙江古寺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由于他自谦对佛教和佛学的了解、知识不足,因此,撰写时除阅读寺院提供的志书、资料外,他搜集和查阅了大量有关书籍和信息,如《高僧传》《景德传灯录》《禅宗大词典》等,有时为了撰写一篇文章得阅读数万字的文字资料。

这本新著博征文献,书后附录的参考文献就达152种。作者考诸古寺遗迹,访谈高僧贤人,对浙江11个地市的古寺文化进行寻迹记录,实现了浙江古寺文化研究的新突破。

浙江古寺很多,超过千年历史的就有百余座。郭学焕说自己能力有限,不及一一记录。于是,他确定了“两必写、一部分”的原则。“两必写”一是,浙江省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13座和省级佛教重点开放寺院26座必写;二是,涉佛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1处,和省文物保护单位35处必写。“一部分”,即部分高僧。在记录古寺的同时,“以寺记僧”,重点记述一部分高僧。历史上,浙江高僧甚众,于是列出了重点记述的四条要求:一是开宗派、创流派;二是有重大著作、对弘扬佛法有重大贡献的;三是担任过全国佛教协会副会

长以上职务的;四是20世纪初及以前的。

根据上述“两必写、一部分”的基本原则,郭学焕考察古寺名刹、拜访住持僧侣、搜集志书资料,四年里先后跑遍了所有在省域内的全国、省重点寺院,在浙江的江南禅院“五山十刹”,大部分涉佛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文物保护单位。其中,如杭州、宁波、温州、台州等古寺较多的城市,考察皆达三次以上。而且每访一处尽可能把情况了解清楚,不然,一次不行两次,两次不行三次,乐此不疲。

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陈永革为这本书作序时评价说:《浙江古寺寻迹》通过持续四年探寻浙江大地上“古寺文化”,深入文献及实地考察,充分挖掘“浙江古寺”所深蕴的历史积淀,以图文并茂的方式,多维度地呈现“浙江古寺”鲜活的当代景观。这部通古贯今的《浙江古寺寻迹》,既引人探寻浙江寺院的“历史之古”,更让人领略浙江佛教的“文化之厚”。

《浙江古寺寻迹》被列入浙江文史研究馆文史丛书,无疑是一本集中记述浙江古寺文化的佳作。走访古寺,搜集、阅读资料,并着手写作,历时四年,郭学焕以其独特的“以寺记僧”“因僧显寺”的写作手法,将古寺与名僧圆满地结合起来,突出了名寺、名僧的历史联结;在五大佛教名山和全国重点寺院的走访考察中,他还将所见所闻的人与事、所感所爱的情与理记录下来。此书图文并茂,夹叙夹议,抒情寄慨,更增进了我们对寺院文化的了解,这使得《浙江古寺寻迹》有益有趣且雅俗共赏。

(作者系本报高级记者)